



胡适文集

【文明卷】

心事書籍
公私用商賈

卷之三

史記

該有他心來贊畫的讚美句。這種贊贊畫的說法，一、當時可以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樂，更有趣。當時，——八九書院活潑地說。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胡适文集

【文明卷】

长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文集:全6卷/何卓恩编.一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445-2597-8

I.①胡… II.①何… III.①胡适(1891~1962) — 文集
IV.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4928 号

胡适文集(全6卷)

著者:胡适

编选:何卓恩

责任编辑:胡新

封面设计:王国擎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编:130061

网址:www.cccbs.net

制版:渲染工作室

印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1 400 千字

印张:92.25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 000 册

定价:(全 6 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24-25872814 转 2050

出版说明

一个“幽灵”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游荡，他就是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幼年曾受私塾教育，后就读中国公学，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陈独秀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 年，离开大陆寄居美国，1957 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 年，在出席一次酒会中心脏病突发病逝。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213 页）其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被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将红学研究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由此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他指出“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提倡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此外，他在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

学等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观胡适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他一贯倡导自由、怀疑、宽容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致力于学术和文化进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的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

由于历史原因，胡适遭到了大陆长时间严厉的批判。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耿云志等学者的努力下，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胡适的浪潮，并逐渐呈现出“显学”之势。因此，阅读胡适，了解胡适，还原一个更加立体和真实的胡适，也就越发显得有必要。

胡适一生，涉及了大量的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的言论，其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关于胡适的著作结集出版众多，形式各异，出版社不一，但大都是规模庞大，专供学者研究之用，且价格不菲。纵观国内市场，几乎没有一套适合大众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有关胡适思想的读物。

为了给现代社会公民提供方便的读本，使读者更便捷地了解胡适的思想。值此胡适逝世 50 周年之际，我社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教授重新编选一套六卷本《胡适文集》。

本文集分为文明卷、政治卷、社会卷、人生卷、治学卷、自述卷，每册再根据内容细分若干主题，在主题下大体按照初次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其内容精炼、篇幅均衡，且兼顾了可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在编辑过程中，我社力求保持胡适著作的原貌，参考了多个版本，并对照原文，重新作了校订，主要校订

原则如下：

一、对外国人名、地名及少量专有名词的译语，如“牛顿”之作“牛敦”、“培根”之作“倍根”、“新西兰”之作“纽西兰”、“爱尔兰”之作“爱耳兰”、“布尔什维克”之作“鲍尔雪维克”、“喀斯特”之作“喀尔斯特”等，为避免在阅读中给读者带来不便，按现在通行译法，在原文后〔 〕中作注加以说明，并以第一次出现为准。

二、旧时的习惯用法，其中包括当时的用语、字词、标点符号用法习惯，只要不会发生歧解的，如“鲁莽”之作“卤莽”、“功课”之作“工课”、“省份”之作“省分”、“想象”之作“想像”、“那么”之作“那末”、“它”和“她”之作“他”、“哪”之作“那”、“只”之作“止”、“得”与“地”之作“的”，以及标点符号如顿号之作逗号、冒号之作逗号、“等等”前存“……”等，一般不作任何改动。

三、其他旧时用语与今天相异的地方，一些重要名词如“中华民族”之作“中国民族”、“两千年”之作“二千年”、“幼儿园”之作“幼稚园”等说法的差异，一般不作改动，以存原貌。

四、原文中有损坏、缺漏或字迹不清者，以□代替，不作变动。明显的错字和漏字的地方，在错字的原字后加〈 〉，里面放入改正字；在漏字后加〔 〕，里面放入补充字。

五、对一些繁体字和不规范用字，如“余”之作“馀”、“于”之作“於”等，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加以改正。

此次出版，在版本的选择和内容的取材上主要以季

羨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胡适全集》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 1994 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为底本，同时参考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出版由胡适自编的《胡适文存》和《胡适文选》、中华书局 1998 年出版的由姜义华编选的《胡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由欧阳哲生编选的《胡适文集》及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由胡明编选的《胡适精品集》等。同时，还新增了一些未曾被这些文集收录的文章。如《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容忍与自由》等。

此外，在本文集的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章开沅、张岂之、耿云志等诸位先生的肯定和支持，并吸收了各种文集的校订成果，以及朱正等学者对《胡适全集》所作的订正成果；同时，也对上述作品中校订有疑问的地方重新作了修订。因体例所限，未便逐篇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新世纪从头说胡适

◎耿云志

胡适（1891—1962），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生前死后颇多争议。胡适由仅供批判的对象变成学者们可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对象才不过二十几年。今天，在中国大陆、在台、港、澳及海外华人圈中，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重新发现了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曾涌现了一大批领袖和精英分子。但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我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基于以下事实：

（一）胡适首倡文学革命，使宣传新思想的《新青年》迅速受到国人普遍关注，遂而演成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意义却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白话国语的盛行并终于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为中国提供了普及和发展新教育的利器，为社会传媒提供了便于传播的利器，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利器。不识字的也能开口讲话，不因鄙俚而遭排斥；略识

字的人则能提笔作文。一整代青年蒙文学革命之赐，打开了走向社会的门径。这一切，都为造成更广大的公共社会空间、为推动社会进步准备了条件。所以，二十多年前我就说，对于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国语的畅行，它的伟大社会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二) 胡适倡导个性解放最力，他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和阐述，大有功于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的深入发展。胡适于1918年6月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摧折了个人的个性，社会就一定缺少生机，就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胡适指出，发展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就堵住了那些把个性解放说成是人欲横流，为所欲为的顽固守旧者的口。中国专制主义、宗法观念之影响人心实在太久太深，以至于一提“个性解放”、“个人主义”，许许多多以卫道自命的人，就深恶痛绝。在使用“个人主义”的提法时，他特别加上“健全的”三个字。

提倡个性解放，提倡自由平等，自然会提倡女子解放，男女平等。胡适所写《论贞操》、《美国的妇人》等文章在当时都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 创立新的学术范式，开启新的学术趋向。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受到学术界和大批青年学生的高度重视。用全新的方法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遗产，此书起了先驱和典范的作用。以后治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人，都不免受到这部书的影响。然而它的影响还不止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范围。他用同样的方法，考证《水浒传》及《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用同样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古史，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引发了“古史辨”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学术趋向。胡适当时总结他的治学方法，简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它在流行中

不免发生某些流弊，但这种方法确实影响了一代学风。

(四) 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有胡适明确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纲领：那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在1919年11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来的。这确是一个较全面的建设新文化的纲领。注重研究问题，无非是立意纠正中国知识阶级重虚文玄理而疏于实际的坏习气、坏传统。当戊戌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感慨“西人日日治有用之学，国人日日治无用之学”，亦正是针对此弊。为了面对实际，切实研究问题，需要借鉴一些新学理、新方法，故要输入学理。这还不够，要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和了解。所以要整理国故，要批判总结中国的文化遗产。只有这几步功夫都做到了，才谈得上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后来，胡适领导整理国故的工作和编译西书的工作，就是实践他的纲领的努力。只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条件把这两项工作长期坚持做下去。

倡导开放的文化心态

在谈到文化立场的问题时，胡适长期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的文化立场，最基本的是主张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

当1935年，由十教授的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所引发的关于“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问题的论争开始时，胡适虽然先表态拥护“全盘西化”的主张，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提法的不确切和易遭误解。因此，他改而提出“充分世界化”的命题。在这前后，他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开放主义的文化立场。主要的是下述几点：

(一)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保守性。它已渗透到民族

生活中去，所以要谈“文化的本位”，其实“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无论如何都毁灭不了的。也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使经历再大的变迁，终不会丢掉它的全部传统的。因此，没有必要为民族传统和文化本位的丧失而操心。

(二) 在文化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事先制定出一个可靠的客观标准，指导文化可以变哪些，不可以变哪些，可以变到什么程度，等等。因此，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不足以胜任这个文化导师的责任，只能由人民，由上述“那无数无数的人民”，根据他们生活的需要去选择、去取舍。

(三)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积累丰富。因此其保守的惰性也格外的大。故尤无必要担心自家本位的丧失。应当特别提倡开放的文化心态，“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可见，胡适的开放的文化心态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他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有充分的信心，故他能做到在国内看重于严厉批评旧传统，要人们反省、自责；到了国外，他则尽力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这表现了一位文化巨人才有的担当精神与魄力。

走自觉的和平改革之路

胡适留学归国时，原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之时，他也不得不渐渐地谈起政治来了。他的基本主张，或是说基本的政治态度是“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他在历次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中，都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用暴力革命可以解决得了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批评他的

人讥讽地简括为“五鬼闹中华”）。要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办法，一步一步地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功。不断的改革收工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到达之时”。这个目的，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

理性的民族主义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曾一度醉心于“不争主义”，以至于当他的女友韦莲司想要赴欧洲参加盟国军队战地救护工作时，他极力加以劝阻。他甚至认为，为了“保存自己”而不惜一战也是错误的。但同时，他坚决反对任何种族歧视，尤其反对在民族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强调，在国内是非法的事情，在国外也一样是非法的；不应加诸白人身上的事，也不应加诸黑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身上。

回国以后，经历许多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之后，他的“不争主义”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绝对化，而是更加理性。他一方面，不赞成任何简单排外或民族复仇主义；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侵略主义和任何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在五卅运动前后，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日帝国主义赔偿、道歉、并开始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他表示不赞成过于情绪化的举动。这是他理性的民族主义态度一次清楚的表现。

人们都知道，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胡适的对日态度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态度。他认为，在平时毫无对付外来侵略的实际准备，一旦大敌来侵，即号召同胞以血肉之躯去与有充分准备和使用现代武器的强敌去拼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他也不能容忍毫无作为、一味退让的做法。他曾批评国民党政府

不做抗争，就答应从河北撤出各级党部。而对在长城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军人们，他则表示由衷的敬意。他更是明确地坚决反对华北一部分军人、政客应日本人之要求使华北特殊化的图谋。为此，日本人曾误认为，华北的反日学生运动都是胡适、蒋梦麟等人主使的。

从胡适的思想言行中，可以看出，在民族的问题上，他是个高度理性主义者。他反对民族歧视，反对强权主义，特别是反对强者方面采取双重标准的立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弱者方面，他不赞成各种冒险的复仇主义，而主张自我改革，积蓄力量、做有计划有准备的抗争。这一点，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他谋求建立有效的维护和平的国际机制，也是一种足资参考的合理构想。

民族问题是最容易牵动感情的问题。因此当民族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义愤多于理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理性的立场往往不易被理解，故极需要有勇气，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因为，要解决那最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只有诉诸理性。若诉诸感情，则只会加深矛盾，问题终难解决。在今天的世局里，我们重温胡适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应是很有教益的。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是胡适研究的权威学者。本文原载于2002年12月19日《社会科学报》，征得耿先生同意作为本文集序，并略有删节。）

自序

“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①

李慎之先生的这一论断，既道出了时代的变迁，也道出了胡适思想的真精神。

胡适与鲁迅几乎是同时登上了 20 世纪的思想舞台，即“从文化上发生觉悟”的五四新文化时期。他们都倡导“新”思想，反对“旧”文化，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但在具体着力点上，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学者们发现，胡适是个相信制度、相信社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思想就像他招牌式的表情一样笑口常开；鲁迅是个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的悲悯主义者，他的思想表情是横眉冷对。胡适以和风细雨式的语调劝告人们一点一滴地努力进行和平的改革，把中国的社会制度往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框架里推；鲁迅则用匕首和投枪去与恶势力作战，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和“痛打落水狗”，其价值取向趋于苏俄的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胡适且福且寿却生不逢时，他对时局的建言每每都是那么稳健，而每每也都是那

^① 见李普：《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炎黄春秋》2003 年第 6 期，第 60 页。

么不合时宜，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①；鲁迅却身逢其世，在一次比一次浩大，一次比一次彻底，一次比一次激越的这个“革命的世纪”，他彻底颠覆旧世界的思想和意志，被视为革命的明灯，因此毛泽东说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时期。短短20余年时间，全民温饱得以解决，国民教育逐渐普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自由民主意识也得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认识到了和平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正途。于是，峰回路转，曾处于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胡适思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

在“革命”当令的时代，胡适及其思想虽曾有过被“统战”、被利用的经历，更多的却是受到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胡适因而被戴上“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反动文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言人”等“大头衔”。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胡适就已逐渐魂归大陆。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其“恢复名誉”的范围，从新文化运动到理性爱国的精神，再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层层深入。研究胡适的资深学者耿云志先生曾讲：“在一定的意义上，胡适研究的进展，人们对胡适的认识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天然尺度”^③。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已经取得累累硕果，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仍需深层拓展，如果我们相信改革不可逆转，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的思想将会大大超越学术评定的领域，并发挥着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③ 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自序》，《胡适研究通讯》2010年第4期，第3页。

更显著的建设性功能。

胡适是一个开风气的学者，对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先后主办和参与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言论刊物。他主张中华文明现代化，“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和平改革中国政治，“用立法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地求进步”；他主张努力培育健全的社会力量，重视教育、学术，也重视舆论风气，一方面强调争取自由独立的言论空间，“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另一方面也特别提示掌握言论“权”的知识分子，要有容忍的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不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还对青年人生经营和学问方法作出平实的建议。这些都是和平时代社会建设的药石。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最近在对编者的谈话中说：“胡适关于社会和国家建设的一些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科学发展观。”^①

胡适的文字并不高深，甚至有人说他“学问简陋”、“思想浅薄”。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②社会文明的常道本来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最有价值的真理常在寻常日用之间。胡适思想看起来不如乌托邦主义那么“理想”，不如黑格尔主义那么“谨严”，不如道学那么“玄妙”，却蕴含着人类最真实的普世价值，这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中国绕不过去。

最后，感谢长春出版社的信任，邀约我来选编这套主要反映胡

^① 2012年11月19日章开沅先生的谈话，地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工作室。

^② 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6日文化版。

适思想的文集。我虽一直从事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考察，也先后编过《殷海光文集》、《韦政通文集》、《夏道平文集》、《雷震文集》等思想性的文集，但我对胡适思想研究还很不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如何精选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大致反映胡适思想的基本面貌，这对我是一挑战。好在向前辈请益的机会很多，章开沅先生的教诲给了我很大启示。耿云志先生拨冗赐教之外，还允赐文为序以示鼓励，令我十分感动。此外，我还得到长春出版社胡新编辑非常具体的帮助，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对文集中的补注作了很细致的工作，在此也特别表示感谢。当然，文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概系编者之责，敬请读者指正。

何卓恩

2012年11月于武昌桂子山